

Summer 2013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June No.21

2013年6月 第二十一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21 期
2013 年 6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3842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编委会顾问

王恩哥 北京大学校长
陈吉宁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程 伟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金德水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Mai Trong Nhuan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l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Tserensodnom Gantsog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理事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禺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强一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b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Chimed Ganzorig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CONTENTS

目录



P.02

→ 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以“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为主题的“上海论坛 2013”于 2013 年 5 月 25—27 日在上海举行。



P.07

→ 2013 年 4 月 25 日，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 2013 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审议与评定中心 2013 年科研资助立项项目。

特稿

- 02 “上海论坛 2013” 在上海举行
- 07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 2013 年科研项目立项评审会

学术活动

- 08 全媒体新闻教育与亚洲国际传播高层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 09 “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文化传统” 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举行

研究进展

- 10 试论儒家思想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以韩日为例
- 17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不足与应对
- 25 “美国重返东南亚” 背景下的柬美关系发展（研究报告）

学者与著作

- 36 《中越关系两千年》
- 37 《英国 17、18 世纪旅华游记研究》



“上海论坛 2013” 在上海举行

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以“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为主题的“上海论坛 2013”于 2013 年 5 月 25—27 日在上海举行。

5 月 25 日上午，“上海论坛 2013”开幕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在开幕式上致辞。世界银行前总裁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美国杜克大学副校长迈克尔·默森（Michael Merson），上海市金融工委书记、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复旦大学金砖研究中心主任

樊勇明等五位知名人士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们分别就世界经济的走势与发展、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机遇与挑战、金砖国家兴起与世界政治经济新动向等各自研究的领域进行了深入阐释。

本届论坛下设了 10 个分论坛，分别是：“增长奇迹之后的亚洲：困境、挑战与选择”、“没有安全资产世界经济靠什么复苏”、“新形势下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路径和政策”、“亚洲智慧：化解纷争之道”、“亚洲法律智慧的多元性与统一化”、“以亚洲智慧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创新驱动和亚洲城市发展”、“如何保障亚洲四十亿人的健康”、“崛起的亚洲可再生能



翁铁慧



杨玉良



朴仁国



林尚立



方星海



樊勇明

源：从新技术、新产业走向新市场”、“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人类关注的焦点”以及“揭开全球安全资产缺失之谜”。

作为每年论坛最受关注的部分之一，本届上海论坛的高端圆桌会议继续聚焦了一系列具有前沿性、挑战性和交锋性的议题。在“揭开全球安全资产缺失之谜”、“智库对话：新机遇、新领导、新责任、新政策”、“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圆桌会议”、“可持续公私伙伴关系：亚洲公共治理的新契机与新挑战”等四场高端圆桌会议上，与会的政、商、学界代表分别从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出发，围绕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与思辨。

5月27日上午，“上海论坛2013”在复旦大学闭幕。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

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在闭幕式上致辞。德国国家能源转型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环境与资源经济及环境管理所所长、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瑞·吕谢尔（Andreas Löschel），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伊莲·芮（Hélène Rey）应邀发表主旨演讲。

2013年度《上海论坛共识》在论坛闭幕之际正式对外公开发布。《共识》认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举步维艰，中国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显著。面对接踵而至的挑战与机遇，亚洲正面临着新的契机。这就要求亚洲利用自身的独特智慧和优势，克服前进中的障碍和困难，在差异中追寻共存与和谐发展。《共识》指出，亚洲智慧的核心是包容促团结、和



Robert Mundell



Robert Zoellick



Michael Merson



Andreas Löschel



Hélène Rey

谐创繁荣，为了深化区内经贸合作，推动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使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让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所有人群，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共识》建议，亚洲需要更具前瞻性地引领科技创新，需要更科学理性地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需要更积极稳健地探索管理制度变革，需要更具耐心地促进区域事务合作，需要更富韧性地推动地区和平稳定。《共识》最后写道：“历史经验表明，亚洲的活力要真正转化成亚洲崛起，就需要全亚洲团结起来，在多元中寻求共识，在和谐中实现发展。亚洲各国应充分尊重彼此差异，充分协调彼此立场，充分开展务实合作，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方面充分实现互利共赢。亚洲智慧，是全亚洲人民

的财富，是亚洲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多元中实现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石。”

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国际经济论坛，发起于2005年。迄今为止，上海论坛已成功举办七届。七年来，共有海内外政、商、学界精英领袖逾2300人次出席。今年是该论坛的第八届全球盛会，论坛始终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通过年会搭建“学界、政界、商界”三方交流互动的平台，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为亚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提出发展建议和决策参考。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附：2013 年度《上海论坛共识》

时代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亚洲应从历史和现实中充分汲取经验，利用自身的独特智慧和优势，克服前进中的障碍和困难，在差异中寻求共存与和谐发展。本届上海论坛以“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为主题，与会代表就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广泛讨论。亚洲智慧的核心是包容促团结、和谐创繁荣。亚洲各国必须相互尊重并凝聚起智慧并将之转化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念、战略、制度、政策与行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亚洲需要更具前瞻性地引领科技创新

应对时代挑战的关键性因素是科技创新。

亚洲各国应洞察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探索并引领新能源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技术路径与应用领域，建构符合本地区资源禀赋特征的现代能源信息系统，将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制度内化于本国或区域内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带动新兴产业的成长，创造新的市场，催生新的增长点，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亚洲需要更科学理性地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

第一，亚洲各国要继续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合作，在 WTO 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框架下增加贸易，并从制度上推进亚洲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国际分工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对内

则通过完善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提高自身的效率，提升对域外出口的竞争力。

第二，面对实体经济的挑战和契机，亚洲国家应通过加强广泛的合作，提升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共同推动亚洲各国和地区的金融合作向着更深的层次迈进，缓解东亚地区金融体系不稳定风险，增强抵御外部市场冲击的能力。

第三，要切实提升亚洲经济一体化水平，将亚洲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金融货币合作所推动的亚洲区域内主要经济体进行产业重组作为主要抓手。

三、亚洲需要更积极稳健地探索管理制度变革

第一，在亚洲地区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需通过城市管理创新和社会体制创新，应对更加复杂的城市管理和生活变迁带来的挑战，创造美好和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第二，面对以新媒体为标志的第四次传播革命，亚洲各国政府应该与时俱进，以开放心态应对网络信息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变迁，逐渐完善适合现代信息社会的新闻传播规制与管理体制。

第三，亚洲各国需要通过合作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分享，寻求公平高效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慢性病给卫生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探索具有各国特色的全民保健之路。

四、亚洲需要更具耐心地促进区域事务合作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亚洲各国应积极寻求区域合作，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和治理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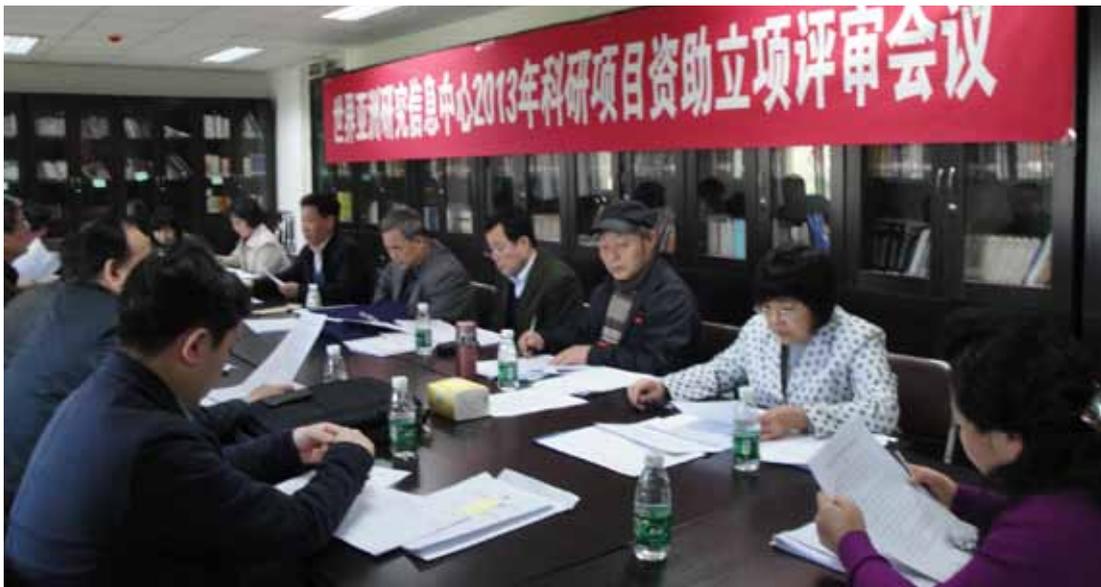
乃至全球的气候变化，并增强亚洲各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发言权。

在法律合作方面，法律多元性为法律智慧的丰富提供了条件，法律智慧为国家间的法律统一提供了依据、创造了条件。亚洲各国应通过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争端解决机制，依据国际法原则来解决区域内的各种争端以及问题。同时，也应尝试推进部分民事法律在主要国家的统一化，探索亚洲法律智慧的交融与和谐的新途径。

五、亚洲需要更富韧性地推动地区和平稳定

谋发展、促合作是当今亚洲的主流。解决当前存在的纷争，要按照立足亚洲、多方借鉴，循序渐进、和平自主，合作共赢、价值整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尊重和遵循亚洲人民的共同意愿和福祉，以寻求地区普遍和平、全面发展与繁荣为目的，致力于各类问题的解决。

“上海论坛 2013”与会代表认为，面对欧美国家纷至沓来的危机，亚洲正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亚洲的未来必将像历史和现实呈现出的一样多元多彩。历史经验表明，亚洲的活力要真正转化成亚洲崛起，就需要全亚洲团结起来，在多元中寻求共识，在和谐中实现发展。亚洲各国应充分尊重彼此差异，充分协调彼此立场，充分开展务实合作，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方面充分实现互利共赢。亚洲智慧，是全亚洲人民的财富，是亚洲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多元中实现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石。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召开 2013 年科研项目立项评审会

2013年4月25日，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2013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审议与评定中心2013年科研资助立项项目。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张西平主持会议，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白淳、丁超、郭棲庆、贾文键、李雪涛、李永辉、罗小东、苗春梅、邵建国、史铁强、陶秀璈、张朝意等出席。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项目资助申报与管理条例修订方案》。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郭棲庆教授介绍了2013年项目总体申报情况、2013年项目资助额度安排及评审要求，通报了本年度学

术著作资助出版立项专家匿名评审结果。

与会委员认真审阅了项目申报材料，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了本年度中心拟资助立项的32个项目，包括课题研究项目21个、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3个、信息汇总项目1个、学术会议项目7个。项目选题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翻译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国际问题研究等11个学科领域。北京外国语大学17个学院、系部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积极参与了本年度的项目申报工作。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全媒体新闻教育与亚洲国际传播高层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2013年3月23日，全媒体新闻教育与亚洲国际传播高层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融合媒体研究中心、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尔顿全媒体国际新闻硕士项目联合举办，由中国新闻史协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协办。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界专家以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从业人员共40余人参加了活动。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原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名誉系主任马胜荣，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郭镇之，

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高钢等作了主旨发言。

论坛分为“走向全媒体的中国国际传播”和“全媒体新闻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部分，与会的媒体人士和学者就全媒体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和全媒体新闻教育等话题分别进行了发言和分组讨论。

论坛期间还正式挂牌启动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尔顿全媒体国际新闻硕士项目。该项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和英国博尔顿大学联合举办，于2012年10月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成为国内首家中外合作的全媒体国际新闻硕士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文化传统” 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举行



2013年5月8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文化传统”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举行。主讲人法国著名汉学家魏柳南(Lionel Vairon)博士作了题为“21世纪的中国软实力 VS 西方几百年的全面实力”的学术讲座。

西方新一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魏柳南博士曾为法国东南亚和中东事务的资深外交官，曾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高等商业学院、国防高级研究院、圣西尔军校授课，在法国三军防务学院主持中国研讨会。2009年出版的《中

国的威胁?》一书，因大胆质疑“中国威胁论”而在欧美政坛引起震撼。在本次讲座中，魏柳南博士以流利的汉语，围绕什么是软实力或巧实力、西方软实力的根源与特征、21世纪的中国如何增强软实力等问题，从一名海外中国研究者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阐述，并与大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和互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试论儒家思想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以韩日为例¹

祝和军 /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校

摘要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广泛传播于东亚地区，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本文试以韩国 / 朝鲜、日本为例，简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开创兼具本民族特色的儒学传统的历史轨迹，以期为我国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借鉴。

关键词

儒学 朱子学 东亚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项目《儒家思想在东亚地区的传播状况及其影响》的研究成果。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伦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学术传统，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早在秦汉时代就越出国界，传播到东亚、东南亚，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对于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甚至还成为这些国家传统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今，世界上许多史学家都把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视为儒家文化圈或亚洲共同体，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一、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

据历史记载，儒家思想传入东亚诸国，朝鲜最早。早在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就在朝鲜半岛设“汉四郡”，儒家思想也随之传入。到了公元 1 世纪前后的三国时期，半岛开始自觉地接受儒家思想。儒家文化自产生以后，本身就处在不断被诠释和解读的过程中，所以儒家文化对半岛的影响也处于波浪般的层层推进的动态过程中。总体来说，朝鲜王朝之前的三国、统一新罗以及高丽前中期以汉唐儒学为主，高丽末期及朝鲜王朝时期则以朱子学为主。

三国时期的朝鲜半岛，不仅在教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伦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学术传统，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早在秦汉时代就越出国界，传播到东亚、东南亚，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对于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育、官制、公服、政治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开始接受儒家思想并在礼制上加以效仿，而且还派大批的“留学僧”和“留学生”赴唐学习。据史料记载，当时朝鲜的“留学生”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贡科及第者就有 58 人。他们精通儒学经典，对体现儒学精神的国家典章制度有着深入的体认和掌握，对儒学的伦理道德也身体力行，回到新罗后推动了儒学在各个领域的实践和传播。新罗于公元 676 年统一了半岛，统一新罗时期，半岛更是大规模地学习儒学，设太学，建太庙，置诸经博士及助教，教授儒家经典，包括《礼记》、《左传》、《尚书》、《周易》、《论语》、《孝经》等，并涌现出了强首、薛聪、崔致远等一批本土化

的儒学大家。

到了高丽末期（中国的元朝时期），朱子学开始传入高丽，并迅速传播。由于“排佛崇儒”的思想对于朝鲜王朝的建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朱子学迅速取代佛教上升为“国学”。从 12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朝鲜朱子学已经有了 700 年的历史，其中 500 年一直处于“显学”地位，朱子学迅速成为了朝鲜哲学的核心。总的来说，汉唐儒学对半岛的影响，远不及朱子学对半岛的影响。朱子学已经成为了朝鲜民族自己的文化，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至今，韩国人仍尊朱子家礼，崇尚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及人生价值观。

与汉唐儒学相比，宋明理学由于深受道佛哲学的影响，更加强调和重视伦理道德，其文化价值也完成了从社会伦理体系向个人道德主义的转化，即在追求天理、人性、义理等知性原理的同时，也强调社会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躬身实践其原理，关注、影响社会，努力使现实世界向天理世界接近。这种主体的道德实践情怀所体现出的“道学精神”，在朝鲜朱子学漫长的 700 年历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朝鲜历史上有名的“节义派”¹以及“士林精神”²，就是由此产生的。

1 “节义派”是指 15 世纪中叶，朝鲜第七代国王世祖取代侄儿端宗登上王位，成三问等六位大臣密谋复端宗王位，因泄密被杀；而金时习等六位大臣则宁死辞官不出。此以“生六臣”“死六臣”为中心形成的“节义派”，其节义精神受到全社会的敬仰，而世祖在位虽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但是其不义行为却不能因政绩显赫而抹去。

2 “士林精神”，是指 15 世纪至 16 世纪上半叶，朝鲜王朝接连发生士祸。受朱子学思想影响，志在民本的士林阶层为防止统治阶级的官僚贵族化而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士林精神指的是内在的义理精神和外在的道学实践。

朝鲜朱子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关心纯属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为天理、人欲、人性、善恶等人生的休养实践问题寻找哲学根据，具有很强的“论辩性”，由此产生了“四端七情论辩”¹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并引发了长久激烈“党派之争”的“礼讼”²。无休止的论辩和党争造成了巨大的内耗，也使得朱子学在经历了复兴发展之后，开始走向绝对和僵化，日趋沦为空空谈的无用之学。特别是在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朝鲜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并目睹了朱子学空谈的危害性，主张由虚返实，重证实测之学，以倡导利用厚生、富国裕民为己任，积极投身到现实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由此，朝鲜的实学结合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文化也就形成和发展了起来。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在半岛地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使之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地区的“四小龙”之一。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信义和节俭勤恳的思想。朴正熙曾说：“正像家庭是一个小的集团组织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在半岛地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使之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地区的“四小龙”之一。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信义和节俭勤恳的思想。

……
 一样，国家是一个大的共同体，无法期望一个不能保持健康家庭秩序的人能表现出对国家的强烈奉献精神，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比与此相反的社会发展更快。”³就这样，在儒家以群体为本位、以家族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韩国企业如对家人一样，承担着高度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经营注重企业成员的目标，把个人的目标统一起来，增强了全体成员的凝聚力和归属感。韩国企业把儒家的“和谐”思想放在绝对的位置，劳动者与企业主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劳资关系，

这样就稳定了企业的发展，避免了冲突，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成员具有奉献精神，那么企业也就具有了一种“诚信”和“敬业”精神。尽管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观念与韩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甚至与韩国人表现出来的商品意识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但是韩国人有意识地寻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创造性地吸收了传统的有用之处并在韩国近代化的民族主义伦理下，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这就是“东亚发展模式”的典型，即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也可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⁴

二、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据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位于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国派使臣到日本解释经典，次年又派五经博士携带《论语》、《千字文》到日本为皇子进讲，由此，儒学经百济传入了日本。

公元592—628年，推古天皇总

1 一场围绕人的“情”问题的本体论的论辩。1554年朝鲜郑之云制作《天命图》，并附上文字解释交给李退溪，李将释文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1558年，奇明彦致书李退溪，对改动做了批评，并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自此，李奇二人就围绕四端七情说开始了八年的学术论争。这一论争成为朝鲜而后三百多年的哲学论辩的主题。

2 “礼讼”，是指高丽末恭让王时期，一切丧礼均按《朱子家礼》举行，太祖时指定“五服制”，实行“三年丧”及“家庙制”。1659年孝宗死，孝宗是以次子身份继承王位的，其继母慈懿大妃为孝宗当服几年丧的问题成为了朝臣之议。儒者宋时烈主张期年说，而南人学者主张三年服制说。最终，儒者宋时烈以“误礼乱统”的罪名被处死。礼讼的内幕是长久、激烈的党派之争。

3 李英姬：《浅谈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载《作家》2013年第22期。

4 郑凤霞、张顺兴：《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载《延边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摄朝政、圣德太子执政时期，日本开始全面吸收中国的儒家文化进行政治改革。在具体做法上，则是以中国当时的隋唐为范本，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全面改造。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措施就是按照“德、仁、礼、信、义、智”顺序制定了表示身份高下的冠位十二阶，并建立大学，对儒学进行传播。这一效仿儒家礼制和政治制度的做法在大化革新过程中一度获得了成功，但很快又随着大化革新的失败而偃旗息鼓。圣德太子似乎一开始并没有真

正领会儒家本身的思想价值，而只是看到儒学的倡导符合其政治需要。也正因此，当时日本的皇家朝廷没能以儒家“尊君仁民”的理想实现政治模式上的中央集权，仅使儒学沦落成为了文字教育的工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本借用汉字创立自己的文字中就能轻易看出。

如果说先期的孔孟儒学是经由朝鲜传入日本，那么，后期的朱子学则是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最初的传播者，是日本的僧侣。朱子学传入后

影响不断扩大，逐渐深入宫廷。醍醐天皇受朱熹“大义名分”思想影响，甚至导演了一场“建武中兴”¹。到了镰仓时代，朱子学逐步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是以主讲儒书、诗文著称的五山禅僧派和博士、公卿派；二是侧重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这一时期的朱子学，虽居于佛学之下，但其影响逐步扩大。到17世纪的江户时代，朱子学逐步摆脱了佛教的从属地位，独立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其中，藤原惺窝脱离禅

1 “建武中兴”是后醍醐天皇恢复权力治世后的事件。镰仓幕府灭亡后，1334年改年号建武，采用中国后汉光武帝的年号，模仿再兴汉室之意。1336年因足利尊氏叛变而中断，让天皇位于光明天皇。

门转向儒学，就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象征性事件。

朱子学在江户初期迅速发展起来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日本从1192年进入幕府武士文化时代，先是经历了“朝廷与幕府的二元政治”向幕府占优势倾斜的时期，后又遭遇了群雄蜂起的战国时代（“下克上”的时代，没有权威，没有法则，只有实力），最终在1598年由德川幕府打败群雄并实现统一。德川幕府靠实力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权，用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武士戒规等手段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统治体制，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这就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学一元政治伦理秩序提供了体制基础。德川幕府时期，兵农分离，武士与土地失去了直接联系，过去以家人、朋党之间的“人情”“恩领”“主从”维系的秩序，已经很难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幕藩体制的需要。而儒家的君臣道德观念，作为一种超越单纯依赖个人感情的客观伦理，正好适应了这种新的伦理需要。朱子学也由此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施行文治主义后，整个日本社会迎来了都市的大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随着和平生活的长久、消费水平的提高，武士的货币支出也开始膨胀，幕府的财政日渐匮乏。在这种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日本朱子学发生了内外两方面的变化。在内部，一部分学者尊信程朱客观唯心主义，排斥一



切异学，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日本朱子学的唯心主义及保守主义成分；另一部分学者则表现出了对自然科学和经世致用之学的关心而逐渐接近唯物

主义，从而客观地发扬了朱子学中“格物致知”的穷理精神。在外部，古学派和阳明学派则对朱子学产生怀疑并大力批判。比如，古学派就认为，哲

学概念和具体的历史是不可分的。历史上只有具体的政治行为，而没有普遍、抽象的道德法则。这种观点无疑从整体上否定了朱子学。而后，西学、洋学的蓬勃兴起，也加速了儒学的解体过程。很多思想家因为商业资本的要求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力图摆脱儒学的束缚，开始研究自然和社会。

从现实层面看，特别是从日本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来看，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儒家思想传播到日本以后，经过日本社会武士阶层的提倡，逐渐转化为一种“克己奉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这种精神，广为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成为迄今为止影响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精神力量。比如，早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德川时期，武士哲学的要旨就是：“武士奉公，不惜以身殉职”。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武士的奉公伦理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正如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谈及明治维新时期领袖人物时所说的：“从事维新的有志之辈，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大义。凡事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而不顾其他，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非常自然。”¹在日本，“克己奉公”的精神还表现为商人的伦理道德。德川时期，作为商人道德伦理的“石田心学”，所要求的

从现实层面看，特别是从日本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来看，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儒家思想传播到日本以后，经过日本社会武士阶层的提倡，逐渐转化为一种“克己奉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

就是对集体及其目标的无私奉献。而勤奋、节俭与理性的素质，正是这种奉献的全面体现。到了明治维新时期，企业家同武士阶层一样，明显提高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国家利益优先”的观念和“产业报国”的精神日益逐渐深入人心。

如今，团体义务感和责任感已渗入到日本人的灵魂深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团体的纽带牢固地建立了起来，以至每个成员都对彼此的行为抱有一种集体责任感。对团体的忠诚和自觉自愿服从其要求，也就成为了日本社会的重要特点。²一位著名评论家就曾把日本人比作一群小鱼：它们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将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打乱了队列，它们有可能改变方向，但仍然成

群游动。这是对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集体观念的形象化描述。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团体，既有遍布全国的各种妇女协会、青年团体、教师家长协会，也有形形色色的业余爱好者团体。就连柔道、花道、茶道，也都有紧密的团体组织。各种协会也同样渗透到从小零售店到大银行或钢铁公司的所有企业之中。这些协会像金字塔一样自下而上地组成广泛而有效的全国性组织，所以日本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有组织的人”。³这种“重团体，轻个人”的价值取向，正是得益于日本社会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改造和吸收，也是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最大差别。

三、儒学的传播轨迹及其启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存在。儒学在朝鲜和日本传播轨迹的差异，归根到底还是由他们的社会生活样式决定的。朝鲜是以农民为绝对主体的单一社会，其经济社会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极为类似，最终也形成了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集团，即以封建君主为塔顶、靠科举选拔官吏为梯队的中央集权制。朝鲜虽有王朝更替，但一个王朝却能维持 500 甚至 1000 年之久，造成了社会的封闭与僵化。正因为此，朝鲜

1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93—294页。

2 李炯才：《日本神话与现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78—179页。

3 《神奇的日本人》，载《青年文摘》1986年第11期。

崇尚的是君子具有话语权的“士人文化”，崇尚理念，强调道德自律。与朝鲜不同，日本社会形成的是上下主从的等级集团。日本的历史也充斥着征服和开拓。这种社会结构和生存模式并没有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单一社会，而是形成了以血缘为核心，但也纳入非血缘的家业集团和士农工商皆有的分工社会。天皇和幕府的二元体制长期存在，虽号称天皇万世一系，但国家实权却经常流转，造成战事频繁、动荡不安。这就决定了在日本占支配地位的是崇尚力量的“武士文化”，强调行动，尊奉他律和原则。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儒学在朝日两国的传播轨迹，虽然在表面上比较相近（均分前期儒学和朱子学两个阶段，均经历了排斥佛教、朱子学影响更为深远），但在本质上存在根本不同：朝鲜最初吸纳儒学时，就将中国儒学和自己的文化相融合，构筑了一元化的体系。到了后期，儒学的政治理想逐渐转化为现实的道学精神，从而导致了儒学的制度化、理念化。而在日本，儒学则自始至终保持着外在性的特征，仅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侧重，表现出了多样性、庶民化和非制度化的特征。反映在学理

越南阮朝建立后，更是独尊儒术，使儒家文化在越南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发展轨迹在表面上亦和韩日类似，但不难推测出，由于民族精神气质、地理、历史、社会生存条件的不同，包括越南在内的其他东亚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在受到儒家思想深远影响的同时，亦形成了各具个性和特色的独特发展轨迹。

上，朝鲜较多地选择了儒学中的“仁”、“理”、“性”等抽象的、形而上学终极层次上的概念范畴，而日本儒学恰好舍弃了这些部分，较多的吸收了“忠”、“信”、“义”等具体使用的中间层次上的行为原则。这样，以普遍的道德人性为出发点的儒家思想，充分融入了朝鲜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成为朝鲜文化的血肉；而日本则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样式和需要，对儒家文化进行解构、割取、改造，以供自己随时随地

使用。

除韩国和日本之外，儒家文化在东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也广泛传播。越南自建立了独立的封建国家之后，从中国传入的佛教就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到公元14世纪前后，儒学取代了佛教处于统治地位。越南阮朝建立后，更是独尊儒术，使儒家文化在越南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发展轨迹在表面上亦和韩日类似，但不难推测出，由于民族精神气质、地理、历史、社会生存条件的不同，包括越南在内的其他东亚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在受到儒家思想深远影响的同时，亦形成了各具个性和特色的独特发展轨迹。但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共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儒家思想中“仁”所包含的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正义原则以及“忠”所体现的秩序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惟有不断反思自身传统的优点与缺点，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上的交流，才能相互了解并建立一个和谐的未来。

主要参考文献

1. 潘畅和：《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2. 潘畅和、金德子：《古代朝鲜朱子学道学精神及其论辩性色彩》，载《东疆学刊》2003年第20卷第1期。
3. 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不足与应对¹

刘欣路 /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

摘要

在国际格局转型加剧以及阿拉伯国家发生剧变的背景下，中阿关系虽总体发展良好，但仍有很多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应更加重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以推动中阿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由于传播文化的有效平台少，加之文化产品的供给与阿拉伯受众的需求存在差异，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还存在明显不足。中国应更加注重对当代文化的整理和弘扬，着力加强对阿拉伯受众的研究，促进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关键词

中国 阿拉伯国家 文化软实力 不足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项目《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不足与应对》的研究成果。

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至今，国际体系正处于新一轮的转型期之中，此次转型与近现代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转型都明显不同，它没有伴随疾风暴雨式的战争或革命，而是体现为和平性的渐进式转变。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国家间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强化的过程中，各国都充分认识到虽然硬实力仍然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终形式，但文化软实力的积极作用比以往更加凸显：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成为区域性或世界性的主流文化，那么其他国家将更容易对其产生好感，并愿意追随其后，努力效仿；如果其意识形态具备普世价值，那么他可以更好地把自身利益和诉求国际化；如果其价值观具有吸引力并被广泛接受，那么其他国家将更容易地理解、支持其内外政策。目前，世界主要大国均将文化软实力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且值得关注的是，由于阿拉伯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安全等领域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各国均着力通过培育和运用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来维护国家利益。

一、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中阿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在“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一系列的内外挑战，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有增无减，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对外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等等。中国无



法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这些困难和挑战，需要若干有效的国际平台以及可靠的合作伙伴来共同应对，而阿拉伯国家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已经成为“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阿拉伯国家不仅在中国维护主权和领

土问题上继续发挥战略依托作用，而且成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调整大国关系、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树立良好大国形象的重要舞台，成为中国防范“三股势力”渗透、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周边”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落实“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文化资源浩如烟海，但当前中国还没有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软实力，中国对阿拉伯国家传播文化的平台和渠道还很匮乏，真正展现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产品数量还很有限。

交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局面”，“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只有通过更加富有成效的、公众层面的文化交流、思想沟通，才能进一步增信释疑，推动中阿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盘点当前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一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与不足。

二、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局限与不足

（一）在阿拉伯国家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平台较少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文化资源浩如烟海，但当前中国还没有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软实力，中国对阿拉伯国家传播文化的平台和渠道还很匮乏，真正展现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产品数量还很有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中国推广汉语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平台，国内外机构合作是其主要运作方式。由于外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需求是开办孔子学院的前提，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孔子学院的数量和运行质量可被视为衡量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指标之一。目前，中国已与近 100 个国家合作建立了 700 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但相比其他地区，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建立的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还非常少，22 个阿拉伯国家中只在 7 个

.....

视，特别是在国际格局转型加剧、阿拉伯国家发生剧变的背景下，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在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空前提升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回应阿拉伯国家日益明显的“向东看”战略，同时使阿拉伯国家对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有一个客观的期待？在美欧主导中东事务，而中国又必须在“坚持韬光养晦”和“积极有所作为”之间寻求平衡的情况下，中国如何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政策认同？当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存在本质差异时，中国如何在双方之间寻求深层次的价值认同？在“中国威胁论”尚有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争取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支持？等等。

应该认识到，解决上述问题不仅需要继续强化首脑外交等传统的外交手段，同时还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要求“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

战略的重要场所，特别是落实企业“走出去”和能源安全战略的主要战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阿关系发展一直较为顺利，特别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各领域合作愈加走向机制化，双边贸易额更是屡创新高，但中阿关系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仍不能忽

国家建立了7所孔子学院、1个孔子课堂和一个孔子广播课堂，占现有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总数的1%强。¹

如果说孔子学院是基于外方需求的合作办学，那么阿拉伯国家孔子学院数量较少的现实，首先说明阿拉伯国家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需求还比较低，中国文化对阿拉伯人的吸引力还相对有限；其次，即便是开设了孔子学院的国家，也不能高估文化的作用，因为中阿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往往是这些国家出现汉语热的主要动因。笔者通过对埃及、约旦、苏丹、阿联酋等国学生的调查发现，大多数阿拉伯人学习汉语的初衷是为得到良好的工作机会而非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最后，文化上的戒备心理也是部分阿拉伯国家对开办孔子学院热情不高的重要因素。在西方国家，儒学思想已流传几百年，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在欧洲思想家眼中，孔子可以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列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三大先驱之一，美国人甚至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因此“孔子”本身就是一个品牌。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则很大程度上将尊孔视为偶像崇拜，担心儒学中包含的宗教色彩以及孔子学院的政府背景会带来文化渗透，从而威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主导地位。

第二，图书。近年来，相关部门

在西方国家，儒学思想已流传几百年，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在欧洲思想家眼中，孔子可以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列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三大先驱之一，美国人甚至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因此“孔子”本身就是一个品牌。



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通过设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项目，资助“有影响、国外读者关注度高、质量好、更多承载中国文化”的图书走向世界。同时，国际合作项目也开始起步，例如，2009年12月，外文局与阿拉伯思想基金会签署了《“同一文明”中阿翻译出版合作项目协议》；2010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签署了《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合作备忘录》；2011年1月，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与埃及出版商协会签署《图书翻译出版及文化项目合作协议》等。这些工作无疑将在未来有力地推动中阿双方在图书方面的交流，加强双方的相互了解。

但从现有情况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图书版权输出和实物出口数量都极少，即便是外宣图书，阿语版也少得可怜。以隶属于国务院新闻办、以制作外宣品为主要职能的五洲传播出版社为例，近年来，该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的外宣图书，其中包括基本国情、中国文化、中外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经济中国、外国人看中国等多个系列，总数达到300余种，但其中拥有阿语版的不足10%。²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阿拉伯民众对新疆“七·五”事件的反应看，大部分阿拉伯人对中国国情和民族宗教政策缺

1 关于孔子学院，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2 五洲简介—图书电子出版，http://www.cicc.org.cn/jianjie_tsjdzcb.aspx。

乏基本了解，对不少重要问题持有偏见和误解，然而除《新疆的招商引资政策》外，关于新疆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的外宣图书均没有阿语版。由此可见，由于数量少，加之缺少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图书在增进阿拉伯国家对中国了解、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第三，影视作品。影视作品不是一般的文化消费品，它可以潜移默化地传播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因此被视为重要的软实力手段。在阿拉伯国家，美国影视作品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尽管阿拉伯人有较强的反美情绪，但他们同时也痴迷于美国影视作品所反映的西方生活方式和自由主义精神。近年来，“韩流”开始风靡中东，韩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口了《冬日恋歌》、《大长今》等一大批电视剧版权，韩国文化通过电视剧开始被阿拉伯民众所熟知和喜爱。

与此相比，中国影视作品在阿拉伯国家可谓难觅其踪。虽然成龙、李连杰主演的一些影片能够在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影视频道中出现，但这些影片往往由好莱坞制作和推广，语言、情节、价值观都是西方的，因此只能被认为是具有中国元素的美国电影。目前，中国影视作品走进阿拉伯国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参加开罗电影节、迪拜电影节、大马士革电影节、摩洛哥电影节等区域性电影节的展播活动；二是在一些国家举办的中国文化节上进行影视作品展播；三是通过



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播出影视作品。前两种方式都属于小众方式，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第三种方式属大众传播，具备较大潜力，但由于目前央视阿语频道的认知度较低，语言制作水平有限，且片源受限，所以效果还不好。总之，在没有大规模商业运作的情况下，中国影视作品在阿拉伯国家无法形成影响力。

第四，文艺演出。中国的文艺团体目前主要在政府文化交流的层面上走进阿拉伯国家，东方歌舞团、新疆歌舞团等艺术团体的演出主要是配合高层领导人出访、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高层会议和文化节等，这种演出

水平高、层次高，但受众范围小，普通民众很难有机会接触。近两年来国内的一些演出团体开始尝试在阿拉伯国家商业演出，例如在2010年，四川德阳杂技团赴阿联酋商演，江西杂技团参加利比亚商演，残疾人艺术团赴阿曼、科威特商演等等，这些演出在当地都获得了好评，但由于刚刚起步，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第五，来华留学生。一国吸引外国留学生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该国文化的吸引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一国的文化影响力又可以借助留学生的辐射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目前，来华留学的阿拉伯学生主要是政府间教育协议框架下数量有限的公费留学生，自费留学生还非常少。2010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和佐格比民意调查公司联合进行的阿拉伯民调显示，只有2%的受访对象愿意将中国列为留学目的地，这个数据在大国中排倒数第二，只略强于俄罗斯的1%。¹ 2010年5月，中国8所著名高校参加了中东地区最大的教育展——迪拜国际教育展，与欧美大学受到热捧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各大学的展位前门可罗雀，没有招收到一名学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通过教育产业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途径还没有得到有效开发。

综上，中国在阿拉伯国家传播文化的平台和核心文化产品数量较少，成效有限。这也可以通过阿拉伯官员在“中阿文化高层圆桌会议”上的发



言予以佐证，如叙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海依尔·瓦迪认为，“目前，在阿拉伯的书店、图书馆中，还很少能找到中国文化的书籍，而在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电视台，反映阿中文化的节目也还不多。”¹ 约旦文化大臣阿迪勒·图维斯表示，“通过电影、旅游以及对文学、诗歌和哲学作品的翻译，可以推动文化交流。但是，阿拉伯人民很少能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影视节目，也很少看到介绍有关中国文化、文明、

工业发展及中国在当代世界贸易活动中独特地位的电视节目。”² 总之，文化影响力是在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如果承载文化的产品和平台数量少，那么必然会影响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进而无法提升文化影响力。

（二）文化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存在差异

自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相关部门开始着力推动中阿文化交流，并较为重视建设孔子学院和翻译《论

语》、《老子》、《孟子》等古代经典。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孔子学院在阿拉伯国家的推进工作并不如预期顺利，很多阿拉伯国家虽然对汉语教学有需求，但对建立孔子学院则持有谨慎和怀疑的态度，至于中国古代经典则更没有对广大阿拉伯民众产生吸引力，因此也无从谈及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显著提高。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没有充分考量阿拉伯受众的实际需

1 2010 Arab Public Opinion Poll, http://www.brookings.edu/reports/2010/0805_arab_opinion_poll_telhami.aspx.

求。中阿之间在历史上一直是友好交往，没有任何历史恩怨，但是与阿拉伯国家用伊斯兰教影响了中国十个民族的精神生活相比，一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则始终局限在物质层面和技术层面，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阿拉伯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是片面的、浅层的。此外，由于宗教的作用，阿拉伯人认为伊斯兰文化完美无缺，其他文化都无法与伊斯兰文化相媲美，特别是非宗教文化，因此，阿拉伯人缺少吸收其他国家深层文化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如果没有大众文化作为铺垫，而急于将精神层面的文化直接传递给阿拉伯人，效果自然不会理想。实际上，阿拉伯人对中国有很大的兴趣，特别对当代中国表示出极大的好奇。笔者自2010年10月至2012年10月作为授课教师参与了商务部组织的10期阿拉伯官员培训工作，其间对200多名学员进行了调查，在回答“关于中国你最想了解什么？”时，选择最多的是“改革开放经验”、“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至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则没有人选择。此外，笔者还在2011年10月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对该校150名阿拉伯学生就同样问题进行调查，结果与之前

中阿之间在历史上一直是友好交往，没有任何历史恩怨，但是与阿拉伯国家用伊斯兰教影响了中国十个民族的精神生活相比，一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则始终局限在物质层面和技术层面，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阿拉伯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是片面的、浅层的。



一致。这个调查虽不系统，但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阿拉伯人最关心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化，而非精神层面的传统文化，也说明我们对于文化产品的供给与阿拉伯受众的需求存在着较大差异。

2011年2月，美国参议院公布了前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报告《美国的另一种损失：中国和美国——网络时代的公共外交》，卢格认为，“中国在传播文化时仍然以四大发明、长城和儒学为核心，这种方式过分强调传统，忽略现状，很难在流行文化当道的国际文化传播竞争中形成竞争力。”¹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韩方明也指出：“利用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进行宣传，是一个国家需要倚重的公共外交的重要工具，但是过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只能告诉其他国家中国在以前的历史中曾经取得了什么成就，却不能让人们知道中国的现状是什么，²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应避免将国内文化建设与对外文化传播混为一谈，避免将我们自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作国际受众真正想了解的东西，切实以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考量和开展文化传播工作，特别是要把现当代文化解释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1 《阿拉伯人想看中国电视节目 嫌西方暴力太多》，新华网，2006年6月24日。

2 同上。

三、关于加强中国对阿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当前，中国正处于“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以文化软实力增进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政策的支持和观念的认同，推动中阿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为此，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中国目前从事对阿拉伯国家文化传播的机构大都存在体制机制不畅的问题，它们往往既要肩负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责任，又要承担“自负盈亏”的结果，从而极大地影响其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应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要求，加快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完善的对外文化传播考核和激励机制。

第二，引导、鼓励有条件的文化企事业单位开发阿拉伯市场。提升对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并非由政府直接塑造，美国也基本没有在阿拉伯国家办过“美国文化节”，但美国发达的文化产业、强大的跨国文化企业承担了培育美国文化软实力的重任，并且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虽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图书、影视、演出、教育等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还

较低，但新疆歌舞团、黄河出版集团、中影集团等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应引导其改变重发达国家市场轻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观念和做法，鼓励其以战略眼光积极开发潜力巨大的阿拉伯市场。

第三，加强对现当代文化的整理和弘扬。中国文化资源十分丰厚，但在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能仅仅考虑我们有什么文化资源，更应当认真研究受众的文化需求、审美习惯等问题。从大众层面看，阿拉伯国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各民族的现当代文化以及经济建设成就和经验，对此，我们应当在大力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现当代文化的整理和弘扬，将真正反映当代中国精神风貌的代表性作品推介给阿拉伯民众，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对接。

第四，加强对现有文化产品和传播渠道的评估。近年来中国逐年加大了对阿文化传播的投入力度，但对实际效果却缺少调研和评估。为使投入切实得到回报，应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定期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相关文化产品和传播渠道的关注度进行系统评估，根据受众反馈及时调整传播策略和传播内容。



1 韩方明：《中国的公共外交真的超过了美国吗？》，联合早报网，2011年3月14日。

2 同上。



“美国重返东南亚”背景下的 柬美关系发展（研究报告）¹

李轩志 /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历史上，柬埔寨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经历了“两断两和”。自20世纪50年代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几经波折，美国对柬埔寨的态度可谓软硬兼施、变幻无常，从最初的拉拢西哈努克政府到后来策动朗诺政变，从投票赞成维护民柬合法席位到坚决反对民柬加入新政府，从对洪森政府批评指责到对其主动示好做出积极回应。在此期间，美国通过在政治上的

不断施压和以经济制裁及援助相威胁的一贯做法，企图迫使柬埔寨改变“中立主义”的立场，倒向“西方国家”，加入制华反共的阵营，但始终都未能得偿所愿，反而将其毫不顾及小国的利益和民族自尊，一味满足自身政治目的的霸权主义思维方式暴露无遗。

1993年柬埔寨新王国政府成立后，柬美外交关系虽然得以恢复，但发展并不顺利，较深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项目《“美国重返东南亚”背景下的柬美关系发展》的研究成果。

的历史积怨成为了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进入新世纪以来,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柬埔寨政府以“9·11事件”为契机,主动向美国示好,表示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期望重修两国关系,但美国的态度并不是十分积极。然而,在2007年,美国对柬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其第7舰队“加里号”导弹护卫舰访问了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成为越战后首次访问柬埔寨的美国军舰,重新开启了30多年来两国业已中断的军事交流大门。之后不久,美国宣布恢复中断长达10年之久的对柬政府间直接援助,两国关系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加里号”访问事件既是美国对柬态度转变和美柬关系发展的重大转折,也是美国与柬埔寨关系深化及军事合作加强的重要表现。然而,与美国宿怨颇深的柬埔寨在同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为何要积极重建和改善对美关系,而一向强势的美国则选择了在此时加强与柬埔寨的联系,并以军事合作和直接援助为突破口,其原因和意图究竟何在?特别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出席2009年7月22日在泰国普吉岛举行的第16届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论坛时,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并宣称“美国已重返东南亚”,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东南亚政策的明确调整——改变对东南亚地区的“漠视”态度,转而积极参与地区机制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在当时背景下,弱小的柬埔寨是无法完全摆脱大国的影响而独立存在的,面对残酷的现实,柬埔寨不得不通过寻求大国援助的方式才得以生存。当然,抱有“中立”幻想的西哈努克希望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偏向其中任何一方。

基于上述背景,项目参与人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对柬美关系的发展历史做了较为全面的资料收集、梳理和分析工作,并对美国“重返”柬埔寨,特别是在其“重返亚洲”、“重返东南亚”政策的大背景下不断加强对柬关系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依据现有材料对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作出了预测,以期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解决中美、中柬关系发展等问题提供可借鉴的意见。

一、美柬关系发展历史回顾

1950年2月,美国与柬埔寨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美国驻柬公使馆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设立。次年9月8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经济合作协定,美国开始实施其以经济援助为条件,拉拢柬埔寨加入反共制华计划的第一步。

美国选择这个时机涉足柬埔寨,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

整个地区的局势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东南亚的殖民地国家已纷纷取得独立,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格局,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基于柬埔寨优越的战略区位,美国希望在柬设立军事基地,巩固其反共战线,从而进一步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影响;另一方面,就柬埔寨的国内局势而言,此时正值其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鼎盛时期,国内抗法的呼声不断,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已是大势所趋,美国人则希望在柬埔寨的独立运动中占得先机,这样不仅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扩大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而且能够避免柬埔寨在独立的过程中倒向共产主义一方。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柬埔寨取得了完全的独立和主权,之后不久,美国将驻柬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进一步发展美柬关系。然而,柬埔寨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打破了美国的如意算盘。1955年4月,西哈努克政府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这一举动让美国人在大失所望的同时不得不寻求新的突破口,以配合实施其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势力扩张战略。于是,军事援助成为了美国人不错的选择。1955年5月16日,美柬签署直接军事援助协定,美国意图采取其一贯的做法,通过有条件的“援助”,用金钱和利益诱惑柬埔寨改变中立主义的立场,加入“东南亚集体

防务条约组织”，进而将柬埔寨作为其战略封锁和牵制中国的“第一岛链”的南端大陆基地。

在当时背景下，弱小的柬埔寨是无法完全摆脱大国的影响而独立存在的，面对残酷的现实，柬埔寨不得不通过寻求大国援助的方式才得以生存。当然，抱有“中立”幻想的西哈努克希望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偏向其中任何一方。于是，他在决定接纳美国的经费、武器和军事顾问团的同时，强调柬埔寨将“遵守中立，不参加任何集团”。然而，这对于抱有“非友即敌”顽固思想的美国人而言是不能容忍的，在面对泰国、南越对柬埔寨的挑衅和入侵时，美国不仅袖手旁观，对其盟国的非法行径置之不理，甚至以援助为筹码来威胁西哈努克：“如果有人由于愤怒而向受美国保护的一方发射出一颗子弹的话，美国的军援就会终止……甚至连利用一辆美国供应的卡车来运输柬埔寨军队同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进行军事对抗都足以构成取消援助的理由。”¹

愤怒的西哈努克不顾美国人的反对和威胁，于1956年访问了北京，并在两年后正式建立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西哈努克访华后一个月，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理事会在曼



谷召开了会议，其中一项内容是讨论如何应对中柬建交问题，会议决定要“采取某种措施”，而具体的措施则由泰国军政府与美国中情局顾问确定。²于是，支持柬国内“自由高棉”等一系列反政府活动便成为了美国及其盟友报复西哈努克的首选。

1963年，西哈努克宣布拒绝美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1965年5月3日，美国不顾柬埔寨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在“火箭行动计划”中轰炸柬埔寨鸚鵡嘴地区，作为抗议，西哈努克宣布与美国断交，而美国中情局则做出了“柬埔寨投靠社会主义国家

确定无疑”的判断。此后，虽然柬美两国在1969年7月恢复了外交关系，但美国人已对西哈努克失去了信任。特别是在柬埔寨提供的运输通道成为了美国实施印度支那反共计划的巨大障碍之后，美国人更是恼怒至极。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估计，从中、苏、北越输往南越的重型武器有85%是通过西哈努克港转运的，当这条海上通道被美国海军封锁后，路上穿越老挝和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成为最主要的运输线。³

1970年的朗诺政变就是美国人报复西哈努克的又一“杰作”。流亡在外的西哈努克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并于1970年5月10日再度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开始了与美国及其支持的反动势力的殊死搏斗。此后直至1991年美国才重新向柬埔寨派驻大使。

1993年柬埔寨第一届王国政府成立后，虽然柬美关系有所缓和，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美国在1997年的“七月事件”中指责洪森政府“违反民主和人权”，随即对柬实施制裁，之后又通过“腐败”、“审判红高”和“培植反对党”等问题和手段不断向柬埔寨政府施压，意图干涉柬内政。这样一来，柬美两国政府关系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美国

1 【柬】诺罗敦·西哈努克口授，W.G. 贝却敌整理，王俊铭译：《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2页。

2 潘一宁：《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对柬埔寨中立的干涉（1956—1971）》，载《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

3 同上。

对柬埔寨继续保持“不冷不热”的态度，一方面保持与柬埔寨的官方关系，一方面则在柬国内培植有能力的反对党派——桑兰西党；而柬埔寨方面虽然迫切期望从美国获取经济支持和援助，但又对美国人的“善变”和苛刻的条件或多或少地存有几分介怀。

二、柬美关系得以改善的柬埔寨因素

从柬埔寨的实际情况出发，柬埔寨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促进其改善柬美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1998年柬埔寨第二届王国政府成立后，美国随即解除了刚刚实施一年的对柬制裁，柬美关系发展出现转机。之后，随着柬埔寨在审判红高问题上做出的让步，使柬美关系得以进一步改善。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后，柬埔寨政府又主动向美国示好，表示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愿意协助美军对塔利班作战，将提供开放领空的方便，并派遣排雷小组到阿富汗。西哈努克国王也致函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反对和谴责一切恐怖行为，并对美国人民遭受生命和财产损失表示慰问。¹

柬埔寨之所以不计前嫌，主动选择与美国修好，也是由其自身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联合国、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享有重要的发言权，柬埔寨需要在一些国际事务和问题的处理上得到美国的认同和支持。此外，柬埔寨的经济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很强的对美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出口国。纺织工业是柬埔寨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也是柬埔寨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1996年10月，美国同意给予柬埔寨贸易最惠国待遇，使柬埔寨的6200种工农业产品以优惠关税进入美国，极大地刺激了柬埔寨对

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也使得美国在柬经济发展特别是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突出。众所周知，美国是柬埔寨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对象国之一，1997年至2005年间，柬埔寨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一直保持持续增长态势。2003年，柬埔寨对美国出口商品价值总额达12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85.4%；2004年，柬埔寨对美国出口商品价值总额达14.97亿美元，占柬埔寨出口总额的70%。² 尽管目前美国面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但美国仍然是柬埔寨产

1 李晨阳、瞿健文、卢光盛、韦德星：《列国志——柬埔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5页。

2 US-Cambodi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Report, 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网站：cambodia.usembassy.gov/uploads/images/eS5k-jNTbtebuWElpRItAA/us-kh_econtrade_relations.pdf。

品尤其是服装品和纺织品出口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第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柬埔寨的援助是柬财政预算和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1992至2005年，美国政府对柬埔寨援助总额约4.44亿美元，占国际社会援柬总额的7.1%。¹ 1997年的“七月事件”后，尽管美国终止了对柬埔寨政府间援助，但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并没有中断，且援助的总金额也未受到太大影响。在1997至2007年的10年时间里，美国对柬埔寨提供的援助绝大部分是通过在柬设立的非政府组织来运作的。根据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报告显示，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对柬提供的援助从2001年的不足3000万美元增至2004年的5500万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柬埔寨第二大援助国。2008年，美国援助柬埔寨开始实行“柬埔寨经济增长（Cambodia Economic Growth）项目”，截止到2012年9月底，美国已先后分四个阶段向柬埔寨提供总额超过7100万美元的援助，对促进柬埔寨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第四阶段的援助项目于2012年9月21日正式签署，援助款项为1850万美

美国是赴柬外籍游客的主要来源国之一。旅游业是柬埔寨王国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也是柬埔寨国家外汇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美国在柬埔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元，落实期为两年。²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给柬埔寨提供的各个领域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对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2012年8月17日，总部位于美国的East Meet West组织公布将向柬埔寨和越南提供总额为1090万美元的援助，旨在改善两国农村公共卫生条件；2012年9月21日，柬埔寨政府与美国政府在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签署了协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向柬埔寨提供34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支持帮助柬埔寨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发展。

第三，美国是赴柬外籍游客的主要来源国之一。旅游业是柬埔寨王国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也是柬埔寨国

家外汇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美国在柬埔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998年至2003年期间，赴柬美国游客数量呈现持续增长之势，尽管在2003年间由于SARS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而出现了小幅下滑，但这一局面很快得到了扭转。据统计，2004年美国赴柬游客总数近10万人次，在各国中位列第三，仅次于韩国和日本。³

三、改善对柬关系是美国为满足自身利益和战略需求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在美柬关系发展的较量之中，虽然两次断交都是由柬方提出，体现了柬埔寨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决心，但最终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美国手中，这一点并没有发生任何转移。2007年柬美军事合作关系的恢复，貌似与柬埔寨的主动示好关系甚大，但实际上最终还是由美国来决定的。美国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基于柬埔寨的要求和利益，而是由其全球战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来决定的，是其为满足自身利益和战略需求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一）柬埔寨特定的地理区位是美国实现其在亚洲战略部署的关键一环。

1 孙维仁、孙非、窦晓青、欧阳万华：《柬埔寨商务指南》，金边：柬埔寨华商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347页。

2 《美国5年间援7000万美元促柬经济发展》，载柬埔寨《柬华日报》2012年9月22日。

3 US-Cambodi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Report, 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网站：cambodia.usembassy.gov/uploads/images/eS5k-jNTtbebuWElpRItAA/us-kh_econtrade_relations.pdf。

柬埔寨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成员以及“泛亚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东南亚的核心位置，战略区位优势明显，向北，可以穿越泰国、老挝进入中国，深入亚洲大陆腹地；向南，可以从西哈努克港出发，通过暹罗湾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亚各国，进而继续向西以远涉西亚乃至欧洲、非洲各国；向东，可以通过湄公河或沿陆路经越南进入南中国海，继而进入海上航道直抵中国、日本、韩国沿岸港口乃至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国家；向西，则可以经缅甸、泰国进入孟加拉和印度。实现美柬关系的良性发展，对未来美国介入亚洲局势，将战略中心转向亚太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柬埔寨的海上石油是刺激美国加强对柬联系的一大动因。

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被誉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血液”，石油资源输出地的转移或是任何新资源点的发现，都会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格局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当今世界，哪里有石油的存在，哪里就会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石油战略不仅决定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而且是构成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美国显得尤为突出。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势力最强的国

美国加强与柬埔寨的联系是为其重返东南亚的战略铺路，以实现在亚太地区的新的军事战略部署。

家，同时也是石油消耗最多的国家，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不到5%，但却消费着世界石油供应量的25%。根据2008年OPEC公布的“前10大石油消费国日均消费量”来看，美国以18953.2桶/日的数字居于各国榜首，其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73.86%。¹

面对如此惊人的对外依存度，美国对石油的“向往”及对石油战略的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2004年12月22日，作为开路先锋的美国CHEVRON海外石油（柬埔寨）有限公司勘探队在西哈努克市以南140多海里的柬埔寨西南主权领海域发现了3处油井，其蕴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这一消息不仅震惊了世界，而且点亮了美国人眼睛，随后，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CHEVRON）领跑柬埔寨石油行业，以最大股东的身份标得柬海上石油6

个区块中的A区块，该区块面积为6278平方公里，据估计，该区块含油气资源最为丰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2006年发布的“柬埔寨经济分析”报告对其油气储量做出了石油4—5亿桶、天然气2—3亿立方米的估测。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7年的报告甚至对该区块的储油量做出了更高的估测，称其储油量或超过7亿桶。

实际上，柬埔寨除了已划分的6个海上区块外，在与泰国存在争议的暹罗湾海域，也有巨大的未经勘探的油田，面积相当于现有6个勘探区块的总和。2001年柬泰两国已签署了共同开发有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备忘录，并成立了联合技术委员会，目前，两国已将该海域划分为四个区域，美国公司已取得了部分开发权

无论是柬埔寨海上石油的勘探还是开发，美国都是“一路领跑”，而美国政府选择在此时一改常态，对改善美柬关系做出积极地回应，并以加强海军合作为突破点，其原因可谓不言而喻。

（三）美国加强与柬埔寨的联系是为其重返东南亚的战略铺路，以实现在亚太地区的新的军事战略部署。

从2007年“加里号”开进西哈努克港前后的关联事件来看，美国对其军舰重返柬埔寨是做了精心的策划

1 李明富：《美国石油战略透视》，载《国防科技》2010年第3期，第79页。

和准备的。早在2006年7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法伦就进行了其对柬埔寨的首次访问，并在访问期间表达了协助培训柬军事人员、提供卡车等普通军事装备的愿望，被视为美国主动与柬埔寨重建军事往来的前奏。而“加里号”进驻西港后，不仅与柬海军进行了海上营救联合训练，甚至还进行了联谊足球比赛、维修当地医疗诊所、为当地村民免费体检等民间及娱乐活动。根据《曼谷邮报》的报道，美国此次选择“加里号”，更是用足了心思，舰上230名官兵中有1/3是当年逃到美国的柬埔寨难民的后代或美柬混血儿。¹表面上看似似乎是为了使此次访问带有一定的“寻根访祖”的用意，而实际上是为了增加亲近感，表达友善之意，以便为将来更多的往来特别是军事往来铺平道路。穆索梅利恰恰表达了美国对柬关系的长远打算：美国军舰访问柬埔寨，是“关系加深的迹象。在过去55年里，两国关系十分不稳定。两国应该友好，一起密切合作”。²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自2007年后，美柬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截止到2010年6月，仅仅4年的时间，已有包括“埃塞克斯号”（USS Essex）、“仁慈号”（USNS Mercy）在内的10艘美国军舰造访柬埔寨。2010年7



月开始，美柬加速举办联合军演，主要包括：2010年7月，柬美两国国防部成功举办2010年吴哥哨兵多国维和军事演习活动，来自柬埔寨、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日本等24个国家及2个国际组织派出的703名部队士兵参加了演习；2010年10月柬美海军联合军演，是柬美两国40年来第一次的海上联合行动；2011年2月，柬美两国在柬埔寨实居省王家军炮兵军事基地联合举行军事演习活动；2011年5月，柬美联合举办的2011吴哥哨兵军事演习在实居省举行；2011年9月，柬埔寨、美国、

澳大利亚在金边市郊和西哈努克省举行“椭圆—查理”联合演习活动，意在促进柬、美、澳三方合作，推动美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上同地区国家发展合作关系；2011年11月30日至12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与柬国军队进行了沙盘模拟演习，演习的假设场景为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害救助，被视为美军第一次与柬埔寨军方展开联合演习；2012年3月13日至15日，2012吴哥哨兵军事演习在柬埔寨举行，100余名美国和柬埔寨王家军士兵进行了条件复杂的多个项目的联合演习；2012年5月5日，美国军舰“哨兵号”（USNS Safeguard）海军官员与10名柬埔寨海军官员共同进行潜水和修复船底训练，这已是这艘美国军舰第6次到访柬埔寨；2012年10月22日至26日，美国两艘军舰USS Vandegrift号与USNS Salvor号在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参加了以“关注提高海域安全保护工作”为主题的第三次柬美海上联合演习活动（CARAT），活动中美国依旧注重塑造其“亲民”形象，不仅通过举办体育比赛和其他社会人道活动，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而且还在柬埔寨贡布省省会举行音乐会，允许当地居民免费观看。

总的说来，虽然各项军演在具体

1 《美国海军重返柬埔寨 截断中国南部海洋线》，新浪网：<http://mil.news.sina.com.cn/2007-02-27/0755432733.html>。

2 《美军战舰开到了柬埔寨 军事援助随即跟上》，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3/05/content_5802093.htm。

内容上变化不大，多以技术交流、地区安全、反恐行动、救灾援助为主题，且美国在行动中依旧保持了其一贯作风，即在进行军事交流和联合演习活动的同时，通过进行一系列人道主义活动，塑造亲民形象，博取民众好感，但对于柬埔寨而言，军演活动在形式、区域、规格层面上都有较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1. 合作的形式日趋多样，柬埔寨在合作中扮演的角色逐步发生变化，开始由“简单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发展到与美联合举办演习活动，这也是两国军事合作关系不断深化的重要表现；2. 行动区域不断扩大，柬美军事合作已不仅仅局限于海上军演，而是逐步向柬埔寨的内陆核心地带拓展；3. 交流的层面不断加深，由“多边参与”发展到“双边联合军演”；4. 演习规模不断扩大，大型双边军事演习逐步成为主流的演习形式。

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军事访问和军事部门援助等途径逐步加快恢复与柬埔寨的关系。2012年11月16日中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抵达柬埔寨暹粒进行访问，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部长狄班就深化两国国防领域的合作关系、人力资源培养和寻找美军遗骸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协商；2012年4月30日，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到访柬埔寨，美国海军“蓝岭”号（USS Blue Ridge）指挥舰也在此期间出访柬埔寨；2012年7月29日至8月11日，



美国“仁慈号”海军医疗舰再次开赴柬埔寨，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活动，期间“仁慈号”的医生为贡布省、茶胶省、实居省、干拉省、国公省和金

边市百姓2万人提供了健康检查和医疗服务，并且还向柬埔寨王家军医院提供医药和医疗仪器的援助。

（四）与柬埔寨保持良好的合作

关系尤其是军事合作关系，美国不仅可以更为有力地打击活跃在暹罗湾的海盗集团，而且能够推动柬埔寨政府帮助寻找越战失踪人员。

2012年6月，美国新任驻柬大使威廉姆·托德在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部长狄班进行工作会谈时就表示：“美国将促进加强柬美两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军事合作。而加强与柬埔寨的合作特别是军事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美国带来现实利益。”

近年来，海上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和地区担忧的重要问题，海盗武装劫持货船、绑架等，都在严重影响着各地区的海上运输，对世界和区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随着马六甲的海盗问题被各国联手干预后，一些原本活跃在马六甲海峡周围的海盗集团开始逐步向暹罗湾转移。由于该水域为泰国、柬埔寨和越南3国共有，且三方在联合打击海盗的问题上缺乏有效的合作手段，使得海盗组织有机可乘，近年更有坐大之势。恢复与柬埔寨的军事合作关系，能够帮助柬埔寨加强海军实力，促使其加大打击海盗的力度，以限制海盗在暹罗湾的活动，同时还有利于增强柬埔寨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2012年8月11日，由美国援助经费和澳大利亚援助办公设备建成的柬埔寨国家海上安全委员会前线司令部办公楼正式启用，也显示了美国加强与柬埔寨合作，共同打击海上犯罪，维护海上安

与柬埔寨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军事合作关系，美国不仅可以更为有力地打击活跃在暹罗湾的海盗集团，而且能够推动柬埔寨政府帮助寻找越战失踪人员。

全的决心。

另外，在美国国防部的作战失踪人员名单中，仍有74人在当年柬埔寨战场上生死不明，他们大多是在1970年扫荡柬埔寨东南部“鸚鵡嘴”地区的越共武装时失踪的。美国军方一直希望能在柬埔寨内陆进行寻找，但柬方以国家主权受损为由，拒绝美方的要求。美国希望通过与柬埔寨进行更多的合作交流，促使柬埔寨政府协助解决失踪人员的问题。

四、刺激美柬关系发展的中国因素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联系，特别是2003年提出的“和平崛起”的新道路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对一向与中国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柬埔寨而言，中国在其国家建设和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从2004年开始，获准的中方企业在柬投资比例大

幅上升。根据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的统计，在2004年批准的55个外商投资项目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投资项目达19个之多，投资总额为8040万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144%，占当年柬批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7.06%，居于各地之首；2005年，中国内地在柬投资项目数量实现了新的突破，全年投资项目41个，是2004年的2倍还多，投资总额4.52亿美元，占柬批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3.12%，仍为柬埔寨第一大外资来源地；2006年中国内地在柬投资继续上涨，投资项目虽然降为31个，但协议投资总额达到了7.17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50%。

2006年中柬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0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两次质的飞跃。面对中国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柬埔寨影响愈发凸显的现实，美柬双方选择主动改善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柬埔寨而言，在“和平中立”政策的大前提下，一方面担心过度地与中国“亲近”而“疏远”美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也希望借鉴东盟其他国家业已成功的“大国平衡战略”，通过利用中美之间的利益和矛盾达到一种制衡作用，维护本国的繁荣和稳定，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2010年1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柬埔寨，企图通过湄公河上游水坝等问题“离间”中柬关系，但柬埔寨媒体并没有对此作过度

报道，而且在希拉里离开柬埔寨后的第三天，柬埔寨人民就热情迎接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到访，不失为一种“顾此不失彼”的“平衡战略”的表现。

对于美国而言，发展对柬关系以牵制中国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早在2002年美国国防部一份名为《2020远景》的报告就明确指出，美军会尽快将战略中心转向亚太地区，以中国作为美国头号假想敌；2004年美国《亚洲能源未来》报告则描绘得更为细致，声称中国正在采取一种“珍珠项链”式的战略，积极在东南亚地区扩大海上影响力，而柬埔寨正在帮助北京修建一条从中国南部通向海洋的铁路线；在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表述中，美国虽然以一种比较积极而务实的姿态看待并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冷战思维”，但其对华政策始终存在软硬两手，实施“两面下注”，在“融合接触”居主流的情况下，相应地增强对中国的“防范限制”；2006年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中国列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视其为最大的潜在军事威胁、主张以加强远程作战能力、强化与盟国关系加以应对。¹由此看来，美国积极改善与柬埔寨的关系，刻意突出加强对

然而，中柬关系的日益密切，既是美国主动缓和与柬埔寨关系的动因之一，也有可能给未来柬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

柬军事往来与合作，既是对中柬关系发展的牵制，又是“防范限制”中国、对所谓的中国“珍珠项链战略”进行反制的手段。

然而，中柬关系的日益密切，既是美国主动缓和与柬埔寨关系的动因之一，也有可能给未来柬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当然，这一变化将最终取决于美国对中柬关系的态度和定位。一些西方媒体曾讽刺性的把柬埔寨称为中国的“同盟”、“盟友”，而柬埔寨“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表态以及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在2012年11月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东亚峰会上的做法更是让他们“大做文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正在通过某些方式表达对柬埔寨的不满。2012年11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柬埔寨，尽管奥巴马在

访问过程中作出了“相信两国关系会更好”的表态，但从美国白宫发布的照片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美国对柬埔寨的不满。奥巴马在柬埔寨金边访问一共花了25个小时，并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森，但访问结束后，在美国白宫官方网站发布的照片一共有13张，虽然有一张远拍的照片中有洪森首相，但照片的说明中根本没有提到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名字。美国New South Wales大学政治科教授Carlyle Thayer对此表示：“当然这是有意的，这是表达不高兴的方式”。²不仅如此，2012年以来柬美双边贸易额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2013年年初，柬埔寨出口到美国的货物总额延续了2012年末减少的态势，且至今仍持续减少。据美国贸易统计办公室所统计的数字显示，2013年1月份与2012年同期相比，从柬埔寨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减少了1700万美元。³

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尽管美国以某些方式对柬埔寨表达了不满，但这些方式的力度和广度都十分有限，短期内并不会对柬美关系的发展造成过度的影响。美国不会放弃2000年以来美柬关系发展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更不会轻易改变其“重返亚洲”、“重返东南亚”的战略部署，而其表达不满的方式更像是对柬埔寨的一种“提

1 张继业、郭晓兵：《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

2 《美官网发布奥巴马访东盟照片 但并未见奥巴马与洪森合影》，载柬埔寨《柬华日报》2012年11月24日。

3 《柬对美国出口货物持续减少》，载柬埔寨《柬华日报》2013年3月18日。

醒”或是“警示”，应该说，美国与柬埔寨关系的后续发展仍有较大空间。

五、结语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尽管美国与柬埔寨有着较深的历史积怨，美国人在柬埔寨的种种行为曾经伤害了柬埔寨人民的民族情感和自尊，而美国也经历了其对柬政策的种种失利，未能实现改变柬埔寨中立立场的最终目的。特别是历史上“两断两和”的外交关系更是给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制造了隔阂。

然而，新世纪以来，在复杂的历史因素、柬埔寨主观意愿、美国的战略需求以及中国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实施了其对柬埔寨的“重返”，使得柬美关系实现了重大转折和突破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美国对柬埔寨

的“重返”直接体现在2007年2月9日美国第7舰队“加里号”导弹护卫舰访问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这是越战结束后美国军舰对柬埔寨的首次访问，标志着30多年来两国业已中断的军事交流大门重新启动；其次，在“加里号”到达西港后不久，就在当月的27日，美国驻柬埔寨大使约瑟夫·穆索梅利就公开宣称，美国总统已决定恢复中断长达10年之久的对柬直接援助，这意味着美国将重新开启对柬埔寨提供政府间直接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通道，为柬美关系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柬埔寨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使得美国对其有所不满，但柬美两国关系恢复发展的大趋势仍然不会改变，正如新任美国驻柬大使威廉姆·托德所说的那样：“我可以保证，美国和柬埔寨的关系依然坚固。美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已有60多年，过去、

现在和将来，美国都一直决心加强同柬埔寨的合作伙伴关系。”

事实证明，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贫穷落后的柬埔寨根本无法摆脱依附于大国以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现实，选择积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将给柬埔寨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然而，对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而言，以军事合作为突破点，恢复对柬关系的正常化发展，也是其巩固世界霸权、实现新的亚太战略部署以及加强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一环。应该说，正是在两国各自利益和需求的驱动下，才出现了今天柬美关系改善转好的一幕。当然，“中国的崛起”也是这其中的不可规避的重要原因。

主要参考文献

- 1.【柬】诺罗敦·西哈努克口授，W.G.贝却敌整理，王俊铭译：《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 2.晨光等译：《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 3.李晨阳、瞿健文、卢光盛、韦德星：《列国志——柬埔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 4.钟智翔、陈扬：《东南亚国家军事地理》，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年。
- 5.付岩松、胡伟庆：《柬埔寨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
- 6.孙维仁、孙非、窦晓青、欧阳万华：《柬埔寨商务指南》，金边：柬埔寨华商日报出版社，2006年。
- 7.潘一宁：《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对柬埔寨中立的干涉（1956—1971）》，载《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
- 8.李明富：《美国石油战略透视》，载《国防科技》2010年第3期。
- 9.张继业、郭晓兵：《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
- 10.辉明：《简析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以东盟和中、美、日三国关系为视角》，载《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
- 11.范丽萍：《导致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分析》，载《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8期。
- 12.柬埔寨《柬华日报》。
- 13.柬埔寨《华商日报》。
- 14.柬埔寨《柬埔寨之光》报。

《中越关系两千年》

文庄 /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书 名：《中越关系两千年》

作 者：文庄（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6月

中国和越南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传统亲密关系。那么，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我国，《二十四史》和历代多种古书中，记载着大量有关中越关系的生动史实。这本小书是把它们加以梳理，并参考越南史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按中国历代的沿革串联起来，以史话的形式讲述两千年来的中越关系。这是前半段。

后半段讲述 1945 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法国和美国先后武装侵略越南；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向越南提供长期的全面支援，支持越南民族解放战争，越南于 1975 年实现了国家统一。在这 30 年的历史巨

变过程中，充满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留下了大量感人的史章，需要去记载、去弘扬。这里只能以割爱的心情去繁就简，集中于若干焦点和核心人物与事件，以期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通过数千年中、越两个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两个邻邦民族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但作为中原主导民族的华族对作为南疆一个重要民族的越族，影响是全面的；而越族对华族的影响则是局部的。两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它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实际情况在相互关系上的反映。对中国历代的沿革，我国读者比较熟悉。本书主要谈到若干越南历史事件，并提供粗略参考。

《英国 17、18 世纪旅华游记研究》

叶向阳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书名：《英国 17、18 世纪旅华游记研究》

作者：叶向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 年

章对中国形象的三个发展阶段或演变过程进行了总结，并对形象生成的复杂性和规律性等问题做了初步探讨。本章在考察形象生成的复杂性和规律性时，特别强调既要重视英国的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状况，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发展背景。因为非虚构游记写作的特色就是不脱离实际，这个实际当然既包括注视者，也包括被注视者，而后者往往为中国形象的研究者所忽视。

总之，本书在以下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意义：第一、首次对本阶段的英国旅华游记文献进行全面挖掘与整理；第二、在游记与形象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第三、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纠正了中外学者在相关论述中的一些错误或不足之处。

本书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对 1637—1794 年间（即英国旅华游记的萌芽和第一个繁荣时期）旅华英国人迄今已出版的全部 20 部游记（或相关报告）所塑的中国形象进行全面的考察，并参照对比了同时代英国其他文类文本以及当时法国等其他西方国家旅华游记的相关描写，在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阈内探讨这些英国游记作者所塑中国形象的特色、150 年间英国旅华游记所反映的中国形象演变的轨迹及其跨文化关系上的意义。

本书的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第

一章回顾了 1637 年前的中英关系及英国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为后文的研究做了史的铺垫。第二至四章对本阶段三个分期内的旅华者及其游记文本的中国形象进行了专门阐述。在全面梳理、归纳这些游记中所反映的中国形象之先，笔者通过总结该阶段英国关于中国的各种出版物与社会思潮来勾勒当时英国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在分析这些游记所塑中国形象的过程中，笔者往往会与同时代其它作品所塑的中国形象进行对比，探讨文本的“互文性”以及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继承性与独创性等问题。第五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